

XUEXI HUJINTAO ZONGSHUJI
ZAI BACI WENDAIHUI SHANG DE ZHONGYAO JIANGHUA
FUDAO CAILI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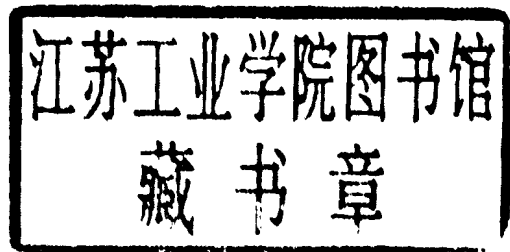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 在八次文代会上的重要讲话 辅导材料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
在八次文代会上的重要讲话
辅导材料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八次文代会上的重要讲话辅导材料
/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059-5713-8

I. 学… II. 中… III. ①胡锦涛—讲话—学习参考资料
②文艺—工作—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IV. D2-0 I2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0998 号

书 名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八次文代会上的重要讲话辅导材料
编 者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许松林 朱 蓓
责任校对	李 彦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713-8
定 价	1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谈谈文艺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中的

地位与作用 何西来 1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文化使命 白庚胜 23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心得体会

和谐文化学习心得 肖云儒 36

世界格局与我国文化发展战略刍议 张 炯 58

文化与综合国力 严昭柱 79

论文艺的继承与创新 吴秉杰 104

和谐社会建设与中国电视剧 刘晔原 112

对当前美术界创作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刘曦林 126

在建设和谐文化中发展书法艺术 邵秉仁 139

谈谈文艺的道德感化功能和文艺家的人格

建设 何西来 150

把握时代主题 坚持继承创新 推进文艺与

文联工作的新发展 杨承志 162

谈谈文艺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何西来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他还就和谐文化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文艺工作者在建设和谐文化,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实践中的作用等一系列相关的重要问题,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阐述。正像当年伟大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光辉贡献在于把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一样,胡锦涛总书记这个《讲话》的光辉贡献就在于把文艺工作与中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历史任务联系在了一起。

什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问题,它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关系问题,还有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中的地位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我们关注的;我们都是文艺工作者,关于文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文艺的和谐问题,文艺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些

问题,也是大家所关切的,必须要有初步的界定和阐述。今天我主要讲四个问题,仅是我个人学习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的心得与体会,不揣简陋,谈出来与各位方家交换意见。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任务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造性的运用与发挥;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是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贵和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与创新。

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这是一切理论推衍的“元”点。

首先,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创造性的运用与发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有三大法则,对立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核心原则是对立统一法则。毛泽东把矛盾论放在突出的地位。从德国古典哲学溯源,最早是康德提出“二律背反”,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样都是正确的。如说世界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黑格尔找到合题,找到否定之否定的环节,提出了对立统一的法则。列宁的哲学著作有《哲学笔记》、《唯物主义与经济批判主义》,毛泽东看重他的《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对对立统一法则有极精彩的阐述。按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论证,对立统一法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切事物都是包含矛盾的;二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对立的两极是互相依存的,存在于一个统一体当中。列宁和毛泽东都是辩证法的大师,都对对立

统一的法则作了天才的发挥。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斗争哲学。阶级斗争学说、生产力关系学说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范围的运用。在社会历史观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强调阶级斗争,把原始社会结束以来的历史,即人类文明的历史,概括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且指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一点,在19世纪70年代初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在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中表现得尤为鲜明而突出。在恩格斯看来,巴黎公社失败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及时向凡尔赛进军,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的资产。应该说,在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工人阶级刚刚迈上争取解放的严酷斗争的舞台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如何争得权力,夺取政权,因此,经典作家尽管也承认矛盾的同一性,但更多强调的却是对立,是斗争。经典作家在理论上作这样的强调是完全必要的、合理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在那种历史情势下,不可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近期的和长远的任务。当务之急是把无产者组织起来,使之从自发,走向自觉和自为,进行抗争,并把这抗争引向夺取政权的革命。

20世纪是暴力的世纪,也是革命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其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中国则发生了新旧两次民主革命。于是只能用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两位革命导师因为长期处于那个战争的暴力的世纪,又都面对着夺取政权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的阐释和运用上,虽然都注意到了矛盾的同一性(或统一性)的方面,但却主要强调了矛盾的对立性的一面,强调对立的绝对性、斗争的绝对性。毛泽东甚至不能容忍党校校长杨献珍在对辩证法的阐释上提出的

“合二而一”，认为这是阶级调和论。但“合二而一”讲的正是矛盾的同一（或统一）性。“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辩证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就形成理论上的倾仄。以毛泽东的敏锐不可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具有战略性的意义的，这两个文献都涉及协调大的社会战略关系，不使矛盾激化，以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平衡、快速、有序发展的主旨，但是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却被大大地推迟了，推迟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我们付出了代价，也使我们的党更成熟。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的提出，正是以辩证法的核心法则为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应有之义，它承认矛盾，正视矛盾，不否定差异，不抹杀冲突，但是却要通过我们党的政策措施，领导千百万的民众，协调社会系统中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解、化解社会矛盾，防患于未然，以保持社会运行的和谐与稳定。就是说给予矛盾的同一性以前所未有的，然而又是符合辩证法本义，符合实际的强调。从强调斗争性，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到强调和谐，强调矛盾的同一性，或统一性，这里包含了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变。从哲学层面上看，可以称之为思维方式从“斗争论”向“和谐论”的转变。现在提出这一思想是有其客观的社会根据。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统计，国民生产总值在人均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阶段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是社会利益调整时期，容易产生社会动荡，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如何化解矛盾？钝化矛盾？使社会经济平稳发展，使社会趋于和谐就是当务之急了。

和谐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状态，是社会各种因素和关系处于一种平衡、雍熙、和合、均衡状态，它是相对于矛盾的激化、冲

突、敌对而言的。以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提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那倒是和谐社会,但那只能是远在天边的理想,当时,这个任务并未提上共产党人非常现实的议事日程。

其次,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的提出,是新世纪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的发展,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经验的历史性的科学总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三部经典性著作分别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是三块理论的里程碑:第一部是恩格斯在1884年3月到5月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71年后,以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为历史背景。这是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了马克思阅读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时所做的详细摘要以及马克思所做的批语和马克思自己的看法。根据马克思的摘要和摩尔根的原著,恩格斯又结合他此前对古日尔曼历史、对古爱尔兰历史、古罗马历史的研究的成果而写成的一部理论的和历史的著作。在这部著作里,恩格斯以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为依据,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男女两性关系的诸历史形态出发,考察了人类婚姻的演变,家庭、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对抗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既然国家是阶级对抗的产物,那么,在将来,“既然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那么,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在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器陈列在一起”。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第一部系统性的奠基性的作品。列宁在《论国家》里说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

字都是正确的。当然有些夸张,但今天再读,还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没有过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活着的时候,除了为时短暂而又被杀回来的反动统治者抛进血海的巴黎公社,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而他们和他们领导之下的无产者,却面对着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官僚资产者的国家机器。所以他们的国家学说重点只能放在对于旧国家机器的解剖和无产阶级如何从旧国家机器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如何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上。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史上,第二部经典著作是列宁在1917年8月,即俄国十月革命前夕所写的《国家与革命》。这本著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作了精要的概括与总结,如果说恩格斯是对巴黎公社失败的总结,列宁则是在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之上,总结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不能现成地利用旧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摧毁它,粉碎它”;“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等等。列宁的这本著作是后来苏维埃政权的建国纲领,也是上一世纪各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后创建新的国家的经典。实践证明这个纲领是正确的,劳动人民的国家确立了。但是到了斯大林时期,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强调出现了偏差,造成了肃反扩大化,成为重要的教训。列宁也谈到了无产阶级多数人的民主问题,但他强调的重点仍在夺取政权,粉碎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镇压与专政上。

第三部经典是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党的生日之前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在总结此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经验和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并领导红色根据地、红色政权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新型国家机器的政治纲领。像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写于十月革命前夕一样,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也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恩格斯当时只有短暂存在 71 天的巴黎公社的失败经验,列宁写《国家与革命》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并无任何掌权经验,而毛泽东写《论人民民主专政》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有了 22 年由小到大、由地方到全国的政权建设与管理经验了。毛泽东对人民下了定义,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行将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叫“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他是这样进行阐释的:“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相比较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的论述,毛泽东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对于人民的阶级成分作了非常细致的界说和规定。这是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除工人阶级外,其他三个阶级都是有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剥削阶级。就是说,在实行民主,享有自由的人民中,不仅包含了作为基础的工农联盟,而且包含了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我们建国的纲领,同时

也是我们建立政权的总结,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法宝。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这几个发展阶段都没有将构建和谐社会的提上日程,在理论上也没有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勇敢地纠正了过去绵延 20 余年的“左”的错误,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全面专政”的路线,把国家转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轨道。近 30 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空前提高,社会空前稳定。虽然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机遇与挑战并存,许多深层次的体制的问题仍然严峻,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文艺工作者必须有这样的眼光与判断。21 世纪初,现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代表新一届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不仅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纲领与远景,而且又是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正在进行的实践。它的理论核心是一个“和”字,是以人为本的人际关系全面和谐,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半个多世纪以后,总结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150 余年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对我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终于提出这个构建和谐社会的纲领,不仅对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华民族是伟大贡献,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全人类也是伟大贡献。我们一定要站在这样的高度上、从这个大的历史坐标上来认识它的意义。因此我们说,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

其三,建构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和”的文化精神的承续与发扬。在先秦的以儒者为代表的礼乐文化中,“和”是处于最核心的范畴之一。孔子有很重要的论述,这就是经常被人们引用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名论。这

是就和的行为主体而言的。郑氏注说：“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刘宝楠进一步申说：“和因义起，同由利生。义者，宜也。各适其宜，未有方体故不同。然各不同因乎义，而非执己之见，无伤于和。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务于是则有争心，故同而不和。此君子小人之异也。”在《论语·学而》篇，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有子即有若，是孔门弟子中最善于发挥乃师思想的一位，所以《论语》首篇次章，即孔子那段“学而时习之”的名言之后，便记录了他的关于孝弟（悌）为仁爱之本的话。他的“礼之用，和为贵”的话，常被一些现代学者拿来概括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或文化价值观念，称之为“贵和”思想，或“贵和”哲学。在上引的这段话中，有若的意思是说，在礼的运用中，以和为贵。从哲学的层面来说，它是多种要素并存下的一种关系的有序的理想状态，含有和谐、雍熙、和合等意思。它既是礼的贯彻方式，又是礼的内在结构状态，更是礼治社会的特点。从伦理的角度来说，和又是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与价值尺度，使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宗族、朝廷、国家相容而不相悖。另外，从字义学来看，《说文解字》释和为调，调和之和，读音与禾同，去声，是一种把许多东西掺和在一起的动作，如和泥、和面等。按照有子的阐释，礼的运用以和为贵，就是先王之道。在有子看来，按照先王之道，以和运礼，用和的方式推行礼治，并达到和的状态，便是美。古代美善互训，这里的美，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审美判断，而是伦理评价。但是，有子看到，如果把和强调得过了头，强调到绝对的程度，忘记了用礼加以节制，那也是行不通的。多种因素共处于一个统一体当中，但

每一个因素又都是不一样的,若强制以一种面貌出现,就使这个系统崩溃,这个系统就不再有活力。正由于诸因素不一样,才能相辅相成地共处在一个统一体当中,因而是有活力的。清人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解释有若的这段话时,作了如下一段颇有见地的案语:“案有子此章之旨,所以发明夫子中庸之义也。《说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训常。郑君《中庸自录》云: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用两义自为引申。尧咨舜,舜咨禹云:允执其中。孟子言汤执中。执中,即用中也。舜执两端,用其中于民。用中,用即中庸之倒文。周官大司乐言六德:中、和、祗、庸、孝、友,言中和,又言庸,夫子本之,故言中庸之德,子思本之,乃作《中庸》。而有子于此章已明言之。其谓以礼节之者,礼贵得中,知所节,则知所中。《中庸》云:‘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和而不流,则礼以节之也,则礼云中也,中庸皆所以行礼,故礼篇载之。逸《周书·度训》云:‘和非中不立。中非礼不慎。礼非乐不履,乐谓和乐。即此义也。’”刘宝楠把和、贵和的观念,与中庸的思想联系起来加以发挥,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从方法论上来看,执两端而用其中,或叫允执其中,就可以避免偏向两端中的任何一端,而失之片面。在多种要素共存的统一体中,每一要素都与其他要素,组成一对一对的关系,如果这一对一对的关系中,每一对都有执两用中的平衡之势,那么整个统一体就会处于有序的平衡之中,就会呈现出中和的、或中庸的、或和谐的总体态势。就是说,和经过礼的节制,就会达到真正和谐的、中庸的理想状态。和是关系的一种平衡态、稳定态。《礼记·中庸》篇的作者,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中庸》历来被认为是思孟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宋代以后,它与《论语》、《孟子》、《礼记·大学》并称“四

书”，是科考命题，做八股文章的主要经典。郑氏注和孔颖达疏都认为《中庸》之作，是子思“昭明圣祖之德”，发挥了中和之为用的思想。《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的喜怒哀乐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即没有感于物而动的时候，心境是处于一种虚静淡泊的状态，这便是中。喜怒哀乐之情生发出来，而又有一定的节制，不狂悖偏执，这便是和。就是说和是允执其中，或执两用中达到的一种和合、和谐的心性状态与存在状态。所以说，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而达到了中和的理想状态，天地就会归于正，万物亦会变化繁衍不息。李泽厚和刘纲纪合写的《中国美学史》中提出“中和”之美，就是以和谐为美，以允执其中为美。作品离不了情感，“感于物而动，谓之情”。《礼记》和《乐记》讲到音乐，要求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乐而不淫，都是执两用中，提起两端。孔子讲的和谐与现在的和谐有很大的区别，是古典的和谐哲学。孔子是氏族贵族的思想家，他希望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每一个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安分守己，不得僭越，他讲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他也同时讲“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而目前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对待社会的弱势群体，在社会收入两极分化极其严峻的历史时期，如何使社会成员平等享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要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及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等等问题，就要靠和谐哲学来指导，这就不是限制在等级当中，而在新的平等的条件下，化解具体的实际矛盾。因此它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的思想积极面的发扬。

和谐社会是胡锦涛总书记代表新一届党中央所一再强调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科学发展观中非常关键的理念。现在人与自然关系,是在工业无限扩张中,采取了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方式,因而出现气候变暖、河流污染、土地沙化等问题。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紧张,跨越出社会的范围。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的理论家,尤其是环境伦理学家突然发现东方的“天人合一”理念,所以在讲人道主义时一定补充这一点:不是统治世界,而是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国最初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观念是董仲舒,当然有他的局限性,影响了很多。比如唐代的诗人杜甫,他的诗中就有现代人才有的环境伦理意识。他住在夔州时,三峡的夏天苦旱,当地人用鞭打石头和点燃山上树林的办法,来驱使老天爷下雨。他写诗批评:“青林一灰烬,云气无处所。”现代人知道树林对水土保持,对改善局部环境起很大的作用,可以看出杜甫就有这种天人和谐的素朴的科学观念。宋代“关学”代表人物张载提出“民,吾胞也;物,吾与也”的观念。胞,是同胞之意,亲如兄弟姐妹;与,是朋友之意。要善待民众,要善待自然,这一观点即使在现代也是伦理学的前沿。这就是著名的“民胞物与”的思想。这个思想文化传统很值得我们发展、发挥、继承。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文艺工作者提出四点要求,就涉及这个方面的问题。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改变思维方式,把斗争思维转换到和谐思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归宿点。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实践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动力。

在前年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全体会议上,胡锦涛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庄严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意见。这既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国际社会提出的热切希望和建议,更是一个负责任的、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的郑重宣言和神圣承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必然是其对内政策的反映与延伸。既然中国人民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自己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战略任务,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因势利导推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要特点的世界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呢?这次温家宝总理赴日访问时,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说也是谈的这个问题,取得大的成果就是“融冰”。我们周围的地缘政治环境是严峻的,周边都是核国家,中国主张东北亚无核化,朝鲜半岛无核化。因此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促进和谐世界的建设,是对内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这么做是得人心的,东盟十国以前对中国是警惕的,我们现在是搁置争论,共同开发。中国的发展惠及东盟十国,这种外交战略是大手笔,是领风骚。一个和谐社会,一个和谐世界,这是承载大国崛起的对内对外的两个大轮。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要确定自己位置,找到发挥自己作用的历史坐标,转变思维模式,走到和谐的轨道上来,是需要这种大胸襟、大器度的。

二、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实践的反映,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的标志、特征,又给予伟大的反作用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实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动力,给予方向的引导和精神的推动。

文艺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从马